

抗戰時期教育經費與高等教育品質： 1937-1945

胡國治

- 一、前言
- 二、教育經費
- 三、通貨膨脹與教育預算
- 四、經費短缺對高等教育的衝擊
- 五、通貨膨脹對教員與學生的影響
- 六、結論

一、前 言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爲了培養持久戰力，發展高等教育爲其重要政策之一。^①這種發展政策能否兼顧量的擴充與質的提昇，則繫於充足的經費與成功的控制通貨膨脹。本文將首先探究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其次剖析國民政府提撥的經費，是否能夠支持其教育擴充的政策；最後論述大專院校師生，在通貨膨脹逐年惡化下所遭受的衝擊。本文史料來源以教育部的報告、教育年鑑、國民政府官方統計數字、國民參政會有關高等教育議案爲主，並輔以抗戰時期大學教育人員的回憶錄。這些史料絕大部分藏於臺北各圖書館，少數來自美國史坦佛大學東亞圖書館，以及澳洲格理非大學。

二、教育經費

大專院校數量擴充與學生人數逐年增加，是抗戰時期主要特徵，也是國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之一。提撥合理數額作爲高教預算，以推動擴張計畫，是此一政策成功的基礎。但是細究此一時期經費來源，卻發現實際經費反而大爲減少。基本上

^① 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2年），頁9-11。

公、私立大專院校經費主要來源有三：第一，英、美等國庚子退款；第二，私人企業與海外捐款、校產與學費收入；第三，國民政府每年度分配至教育部的預算。此外，學校所屬省政府亦提撥部份經費。

就私立大學而言，大多數為基督教所設置，經費以海外母教會為主要來源，其中尤其是以美國的教會佔絕大比率。據教育部民國二十八年統計，五十三所私立大專院校主要財源收入依靠校產、捐款、英國庚子退款、與學費。^②而公立學校則以中央及各省府預算、庚子退款等款項維持年度費用。

下面本文將逐一探討這三種經費來源，以論析這些經費是否足以維持大專院校的年度費用，並進一步支持國民政府在戰時的高教擴充政策。

庚子退款

民國十四年以後，庚子退款對於高等教育的發展，有重要貢獻。國內大多數公私立大專院校，都分配到庚款，並成為各校穩定的經費來源。盧溝橋事變後，庚款停頓，各校頓時面臨財源不繼的危機。

美國率先於各國退還部份庚子賠款，這筆退款對於中國高等教育有重大貢獻。由於美國庚款，清華學堂能於1911年設立，並於1928年改組為清華大學。中國應付美國庚子賠款原額為美金 \$53,348,000 元，但是，美國於1908及1924年兩度決定由原定賠償金額中收取定額後，餘額退還中國。從1909年到1940年之間，退還總額達美金 \$28,922,519 元。^③這筆美國庚子退款除少部份支助其他文化及教育活動外，絕大部份用於清華大學；其餘部分則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保管支配。每年直接受到該款補助的大學、研究機關、文化團體平均約三、四十個單位。該筆基金分兩種方式補助專科以上學校：第一、設置科學教授席位分配至各大學，並與指定大學合設講座；第二、補助各校建築設備及研究維持費。^④下表一顯示美國庚款各年度補助金額：

由表一分析可以得知，美國庚款除了民國三十四年外，每年均補助十所以上的大

② 教育部編印，全國高等教育概況（出版地不詳，民國28年），頁17。所謂校產收入，多為學校在其他項目投資的利潤、股息或校產出租的收入。

③ *China Handbook: 1937-1945*, pp. 210, 342-343, 各國庚子退款詳情見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4年），頁269-556；美國庚子退款見 Michael H. Hunt,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3 (May 1972), pp. 539-559; 退款總額見王樹槐前書，頁287。當時美金與國幣的兌換率為1: 3.3。

④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1574；革命文獻，五十六輯，頁68。

表一：美國庚款補助文化機關一覽表

類 別	大學	研究 機構	文化 團體	其它	補助金額
民 國 25-26 年	12	9	3	3	國幣 美金 909,100.00 26,500.00
26-27 年	24	11	7	6	國幣 美金 981,800.00 64,300.00
27-28 年	15	6	6	6	國幣 美金 1,344,800.00 14,362.12
28-29 年	15	9	6	6	國幣 美金 896,100.00 75,300.00
29-30 年	11	3	4	1	國幣 美金 980,600.00 18,000.00
30-31 年	15	9	7	1	國幣 美金 2,300,400.00 9,965.75
32年	10	9	6	2	國幣 美金 2,470,600.00 19,003.00
33年	10	7	5	2	國幣 美金 3,468,000.00 33,363.86
34年	6	6	7	2	國幣 美金 5,230,000.00 50,000.00
合 計：					國幣 美金 18,581,400.00 310,794.73

資料來源：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1574。民國26-27年受補助的大學數達二十四所，美金款項為64,300元，與前一年度相比，約增加2.5倍。其原因為盧溝橋事變後，二十三所學校在日軍轟炸與破壞下嚴重毀損。總計受戰事影響而被迫遷移的學校達九十餘所，約佔當時全國大專院校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除中央大學及少數設於內地的大學外，絕大多數學校的儀器、設備與圖書，不是毀於戰火、散失於遷徙之中，即是遺留於日軍佔領區不及攜出。民國26-27年這筆突增款項應為補助各校遷移及重建之用。

學。但是，抗戰發生後，受補助的學校數量及金額均呈現不規則的變化，時多時少。經費來源不穩定，學校運作及發展必受影響。

英國亦於民國二十四年正式決定退還庚子賠款，一半款項由倫敦購料委員會支

配，另一半則由中英庚款董事會統籌管理。⑤以全部退款為基金投資於生產事業，所得息金作為教育及其它用處。高等教育研究機關佔所有息金比率的百分之三十五，以補助農、工、醫、理四學科為主。⑥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均受惠於此項補助，下表說明歷年補助金額：

表二：英庚款補助大專院校金額

年 度	金額（單位：國幣元）
23	275,000
24	295,000
25	755,000
26	1,305,000
27	685,000
合 計	3,315,000

資料來源：革命文獻，五十六輯，頁67。

二十八年度以後的資料不詳，不過抗戰軍興以後，息收減少，補助各校的金額劇減亦為事實。

由於與美、英商訂平等新約，國民政府分別於民國二十八年及三十一年，停付美國庚款及英國庚款。⑦長期倚賴英、美庚款補助的大專院校，則立即陷入財務困境。

私立學校財務來源：校產與捐款

- ⑤ 英國議會雖然於民國24年才正式批准退還庚款，使用該款實際已於民國20年開始。詳情見王樹槐前書，頁426-479，頁474。China Handbook: 1937-1945, p. 347。
- ⑥ 革命文獻，五十六輯，頁67。
- ⑦ 雖然新約於31年才簽訂，國民政府實際上已於28年停付美國庚款，見 China Handbook, pp. 211, 343。

抗戰以前，私立學校除了接受各省與中央政府部份財務支援外，其主要經費來自於學費、校產收入與海外捐款。抗戰時期，私立學校則飽受學費、海外捐款逐漸減少與通貨膨脹急劇惡化雙重的打擊，而益顯經營之艱困。校產收入一直佔著私立學校經費的重要比率，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在日軍肆意轟炸、破壞下，原有建築大多數嚴重受損或為日軍佔領。倉惶中能僥倖運出的校產，在日軍再度截擊與轟炸下，能全然運抵大後方者，所剩無幾。海外捐款受歐洲戰事影響，西方國家自顧不暇，捐款銳減。儘管如此，查證抗戰期間私立院校收入狀況，政府財務支援雖然大增，校產與捐款卻依然是主要財源。表三統計私立院校各類收入。

表三：私立大專院校各類收入狀況（單位：國幣元）

年 度	校 產 與 捐 款	政 府 補 助	學 費 及 其 他 收 入	總 計
24年	6,230,257	1,563,502	5,957,677	13,751,437
26年	6,901,461	1,282,755	3,656,348	11,840,564
27年	5,875,630	2,114,420	3,725,865	11,715,915
28年	6,778,295	2,465,123	4,317,673	12,961,091
29年	8,805,291	2,372,920	6,051,722	17,229,933

資料來源：25年度資料不詳。24年度資料引自教育部編，全國高等教育概況（出版地不詳，民國28年），頁17-18。26年度至29年度資料引自教育部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出版地不詳，民國30年），頁80。

由表三分析可以得知，校產與捐款一直為私立院校主要財源，依次則為學費與政府補助。校產與捐款所佔比率，在二十四年度為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十六年增為百分之五十八，次年降為百分之五十。二十八年又回升至百分之五十二，二十九年再略減為百分之五十一。至於政府的補助對於私校在戰時的維持與發展經費，並不佔重要的比率。但是，由每年略增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政府有意協助私立學

校。二十四年度政府補助款項約為私立院校總經費的百分之十一點四。二十六年降為十點八，二十七年跳增到百分之十八，二十八年則為百分之十九，二十九年劇減為十三點八。如果僅由表面的數字觀察，二十九年政府提撥的補助金額約為二十六年的兩倍弱，無疑的說明國民政府有維持私校的意願。但是細究戰前的補助金額卻發現：二十六年度政府補助低於戰前的水準，二十九年的金額與前一年比較，也相對的減少了。再把戰時通貨膨脹下，貨幣貶值的因素列入考慮，則政府補助款的比率就更形微小。在當時通貨膨脹急劇惡化的情況下，經費來源更形拮据，本文將於後面逐一討論。

政府教育預算

抗戰時期由於其他經費來源緊縮或停止，相形之下，政府教育預算對於公私立大專院校的運作，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公立院校更形依賴政府年度預算為唯一可靠的財務來源。然而，盧溝橋事變以後，政府移撥大量經費以供對日軍事活動之用，高等教育經費立即被刪減了百分之三十。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年底，經費刪減進一步擴大，與戰前相比，約削減了百分之六十。^⑧

以北京大學，清華，及南開合組的西南聯大為例，教育經費刪減了百分之四十，嚴重的影響了西南聯大的收支。經費的短缺可以從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文章中得以證實，他描述清華在民國二十八年的時候，每月經費不足80,000元國幣。^⑨北大、清華與南開雖然已合組為西南聯大，但經費來源則各自獨立。北大及南開幾乎完全依賴政府預算，清華則有美國庚款的支援。^⑩當政府停付庚款以後，清華收入銳減，僅能從原有庚款餘額中收取利息。^⑪

西北聯合大學面臨相同的財務困境。這所由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北洋工學院三所院校組成的聯合大學，僅收到約相等於戰前百分之四十的經費。相形之下，其他學校的財務危機則更為嚴重。同濟與暨南大學的預算約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被刪減。^⑫這種減成撥發經費的狀況持續於整個抗戰時期。

由於政府教育預算是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唯一可靠的財源。基於此一事實，高等

⑧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511；全國高等教育概況，頁20。

⑨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教育通訊，卷2，期23（1939年6月10日），頁8-10。有關西北聯大經費之刪減與不足見：十年來之教育概述（出版者不詳，民國27年），頁46；教育雜誌，卷29，期10，頁54。

⑩ 吳大猷，「抗戰期中之回憶」，傳記文學，卷5，期3，頁7。

⑪ 梅貽琦，「三談抗戰期中之清華」，傳記文學，卷8，期5，頁13。

⑫ 十年來之教育概述，民國27年，頁46。

教育能否維持一定水準，則端賴政府能否提撥充足的經費。高等教育經費所佔政府預算的比例，目前並無完整詳確數據，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下表四中的數字，看出

表四：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歲出經費數中的比率：民國25-34年

(單位：百萬元國幣)

年 度	政 府 歲 出 經 費 數	教 育 歲 出 經 費 數 ¹	百 分 比 ²	高 等 教 育 歲 出 經 費 數	百 分 比 ³
25	990	54.9	5.5%	39	3.9%
26-27	2,103	36	1.7%	30	0.9%
27 ⁴	1,181	20	1.6%	15.5	1.3%
28	3,063	43	1.4%	37	1.2%
29	5,425	116	2.1%	58	1.06%
30	10,892	176	1.6%	91	0.8%
31	26,602	505	1.9%	196.9	0.74%
32	63,352	1,178	1.8%	419.8	0.66%
33	182,832	3,790	2.0%	1,869.8	1.02%
34	1,266,438	22,438	1.8%	6,653	0.52%

資料來源：政府歲出及教育歲出經費數，25年度數字見全國高等教育概況，頁20；其他年度參見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6；高等教育歲出經費數見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1414。

¹ 教育歲出經費數包括官方報紙，中央通訊社經費，國際交換計畫及三民主義青年團年度費用。參見國民黨編印，四年來之教育與文化，出版地不詳，民國三十年，頁3；張伯瑾，「教育上三個必須先決的問題」，教育雜誌，卷29，期9，頁1。

² 此一部份的百分比為教育經費在政府歲出經費中所佔比率。

³ 這一部份百分率為高等教育歲出在政府總歲出經費中所佔比率，但數字中不包含公立學校教職員生活補助費。

⁴ 27年度高等教育歲出經費原為31,125,068元國幣，為配合前述數字，以半數的概約數字為準，以便統計。

教育經費在政府年度支出中所佔的比率，進而瞭解國民政府是否提撥足夠的經費，以維持高等教育的運作。

由表四分析可以看出，教育經費在戰爭爆發以後劇減，由戰前佔政府歲出經費的百分之五點五，降至百分之一點七。而高等教育經費則由百分之三點九降低為不到百分之一的水準。審視整個抗戰八年，高等教育經費從未恢復戰前的水準，經費不足的情況極為嚴重。最佳的狀況是在二十七年度下半年，經費也僅約為戰前的三分之一；最糟的時候發生在三十四年度，僅及戰前八分之一強的水準。在經費年年不足的狀況下，精簡機構以維持高教品質，似乎是較為合理的政策；然而，大專院校的數目卻由二十六年度的九十一所，逐年跳增至三十四年度的一百四十五所。這說明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擴張高等教育的同時，缺乏事前對於本身財務能力的評估。僅盲目追求數量的成長，不但未能顧及教育品質的維持，更陷全國大專院校於財政困境，所有師生於飢餓邊緣掙扎。

經費不足，加上逐年惡化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大為減低了教育經費的實際價值，以致絕大多數院校忙於應付財政赤字的重擔。西北大學校長賴景瑚回憶：在不足的經費與通貨膨脹雙重因素下，西北大學遭受嚴重的財務困境，他每年必須數度向銀行借貸以渡過難關。^⑬賴景瑚向銀行借貸以渡難關，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則利用他的身份在四川省境內募款以維持川大的運作。黃季陸本人是國民黨重要成員，從民國二十年後，即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八年起負責四川省省黨部工作，同時於二十七年起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幹事。集這些職務於一身，使他在接觸社會士紳、名流之際，易於籌措款項。黃籌款的詳情如何，不得而知，其方式卻引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李琢仁等人聯名質詢。民國三十二年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中，李琢仁等人向教育部質詢，並抨擊黃季陸，以募集獎學金為名目，向四川省各縣強迫籌款，金額高達七千餘萬元。李等人的質問包含兩大部份：第一，黃校長籌款的做法是否事前獲得教育部的批准；第二，希望教育部追查這些款項支配的情形。教育部的答覆承認黃所做所為不符合規定，而且該部已令四川大學呈報詳情。^⑭但是，目前並沒有進一步史料證明黃季陸是否曾經受到警告或行政處分。在當時財源艱困的狀況下，四川大學向民間募款並非唯一特例，幾乎所有大學都得各自設法，籌集經費，以渡過難關。

^⑬ 賴景瑚，「西北工學院與西北大學」，傳記文學，卷8，期5，頁13。

^⑭ 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大會教育部答覆參政員李琢仁等詢問案，頁碼不詳（民國43年油印）。

三、通貨膨脹與教育預算

除了經費不足以外，各校在戰時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卻是通貨膨脹。據一項統計，民國三十二年教育經費的實際價值，僅相當於民國二十五年的七分之一，民國三十三年僅約值十一分之一。^⑤這項說法的準確性有待證實，在經費總額受到刪

表五：戰時通貨膨脹下物價與教育經費成長之比較，民國26-34年

時 期	物 價 增 加 率	教 育 經 費 成 長 率	
		名 目	實 值
民26年 7 月	1.0	1.0	1.000
12 月	1.2	—	—
民27年 6 月	1.4	0.5	0.357
12 月	1.8	—	—
民28年 6 月	2.3	1.19	0.517
12 月	3.2	—	—
民29年 6 月	4.9	3.3	0.673
12 月	7.2	—	—
民30年 6 月	11	4.8	0.436
12 月	20	—	—
民31年 6 月	36	14	0.389
12 月	66	—	—
民32年 6 月	132	32	0.248
12 月	228	—	—
民33年 6 月	466	105.3	0.226
12 月	755	—	—
民34年 6 月	2167	623.3	0.288
12 月	2491	—	—

資料來源：本表以民國26年1月至6月的物價為基數1。物價指數的資料，來自國民政府控制區城市中的躉售價平均指數。民國三十年以前的物價資料來自農民銀行出版的中國各大都市躉售價指數（民國26年7月到30年6月），引自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pp. 348, 358。教育經費成長率亦由 Arthur N. Young 書中資料計算而得，見 p. 16。

—表示資料不詳。

⑤ 陳友松，「戰後中國教育經費問題」，教育雜誌，卷32，期4，頁40。

減，而實質又大為降低的狀況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困境不言而喻。由表五我們可以比較戰時物價在通貨膨脹影響下的增加率，與教育經費實際成長，以便獲得教育經費的實際價值。

表五的資料顯示：教育經費無法與抗戰時期的通貨膨脹率成等比的成長。以民國二十八年六月為例，物價上漲 2.3 倍，而教育經費僅增加 1.19 倍。而且情況逐年惡化。民國三十三年六月，物價上漲 132 倍，教育經費僅僅增加 32.7 倍。通貨膨脹惡化的程度在民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達到無法控制的狀況；物價分別上漲 466 倍與 2167 倍，然而教育經費卻相對的成長緩慢。如果我們再細究教育經費的實際價值，可以發現，教育預算的實際購買力，遠較戰前為低。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時，教育經費實值僅為戰前水準的五分之二。民國三十年起通貨膨脹惡化的徵兆已經出現，此後教育經費的實際購買力逐年急劇下滑。三十三年降至戰前五分之一強的情況。在這種大專院校無法控制的經濟變動狀況下，高等教育遭受嚴重的經費短缺，而且預算赤字逐年增高。

各大專院校經費不足的詳確數字，不得而知，然而，我們可以從民國三十二年教育部第三季工作報告中看出，經費短缺的情況。表六的數字顯示，在國民政府刪減教育經費下，高等教育在戰時遭遇的財政困難。

表六：民國三十二年第三季教育報告中有關教育經費赤字

(單位：國幣元)

上一季赤字	預算	支出	累計差額
-3,250,087	15,556,673	18,401,031	-6,094,446

資料來源：教育部編印，教育部三十二年第三季工作進度檢討報告，頁碼不詳。

從上表看出，民國三十二年度，僅僅第三季經費的不足，即已達到百分之十八左右的程度。如果與表五對照就不難發覺，經費短缺的現象逐年惡化，這顯示：國民政府在戰時提撥高等教育的經費，不足以維持各校的基本運作。

如果我們檢討抗戰時期的特殊狀況，可知高等教育所需額外經費遠超過平時。因為戰爭爆發後，在日軍肆意轟炸下，大專院校房舍大多受到摧毀，學校設備儀器

也多數受損。少數搶救出來的圖書、儀器在搬運途中，再度遺失或毀損。戰事擴大後，位於北平、天津、上海附近精華區的大專院校，均受戰火波及，在倉惶中遷至租界或大後方。校舍無法遷移，圖書、儀器能隨之搬出者，也僅為少部份。這些戰爭的損失至為嚴重，急需大筆經費重建校舍，重新添購儀器設備與圖書，更需要特別經費安置流散的教職員及學生。這些額外花費沒有其他來源，必須從原定預算項目中挪用，勢必影響原有計畫的推展，增加經費似乎是解決此一困境的合理方式之一。然而在抗戰軍興，一切以軍事成敗考慮為優先的狀況下，教育無法獲得充足經費，以彌補這些戰爭的損害。

在教育經費緊縮，高等教育費用赤字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若要維持教育的品質，以採取謹慎態度，控制學生招收的數量，並嚴格限制學校規模的膨脹與發展，應該是合理而可行的措施。但是審視抗戰八年期間，高等教育的政策卻是朝着大量擴充學校數量與擴大招生的方向飛躍前進。非但如此，公立學校受命配合此一擴充政策，必須每年增收額外的學生，造成學校沈重的負擔。南開、清華與北大所組成的西南聯大，就是在這種狀況下，面臨沈重的財務困境。^①我們由下表七可以瞭解

表七：大專院校及學生人數統計：民國25年-34年

年 度	大 專 院 校 數	學 生 人 數
25	108	41,922
26	91	31,188
27	97	36,180
28	101	44,422
29	113	52,376
30	129	59,456
31	132	64,097
32	141	73,669
33	143	78,909
34	145	83,498

資料來源：歷年大專院校教育數字，民國30年度以前，引自中華民國教育統計，頁3，頁63；31年度，來自革命文獻六十輯，頁118；32年度引自革命文獻五十八輯，頁402；32，34年度數字見 *China Handbook: 1937-1945*，頁328；歷年學生人數，引自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526。

① 梅貽琦，「續談抗戰期中之清華」，教育通訊，卷3，期15，頁12。

抗戰期間大專院校及學生人數增加的概況。以大專院校的數量而論，抗戰結束時有145所，與戰爭發生前的108所比較，新設的學校增加了三分之一強，若與戰事爆發後的第一年學校數相比，則新設學校增加五十四所，增加率約為百分之六十左右。再剖析學生人數比戰前增加一倍的狀況，可以下一結論：戰時學生人數及學校數量均呈現大幅度的成長。

在學校數量倍增的現象背後，有一項值得注意的事實，即是教育部在命令各院校增加招生名額與設立新科系的同時，並沒有相對的提撥經費以與配合。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回憶任內學校的困窘狀況：抗戰以後，教育部要求中大設立航空工程與水利工程兩系，以後兩年內又命令增設醫學院。六年來，教育部未曾提撥分文的經費以為支助。羅本人也很意外，未增分文經費，新設科系居然也存在了六年。^①沒有政府經費補助的情況下，學校必須從其他科系的費用上挪用，以供新設科系教員薪資及購買圖書、設備。更急切的問題則是新聘教員宿舍以及新招學生的食宿等項目。中央大學的情況，可視為戰時各大專院校共同面臨的問題，而非特例。

教育部的高等教育擴充政策引起國民參政會的注意，並曾多次決議：「要求大學教育今後應從質的方面切實改進，為免使師資再加缺乏，設備更形簡陋起見，不宜再行增加大學及學院。」^②教育部對於參政會的決議有書面的答覆如後：「專科以上學校之質的改進，教育部早經決意辦理，至增設學校院系最為慎重，非確有需要或原已定案者，而不輕易增設。」^③這份書面油印的教育部公文倒像一篇反駁文章而非答覆。由於實際教育品質問題並未解決，國民參政會於一年後再度議決，送請教育部注意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並要求充實設備。^④簡而言之，高等教育在抗戰時期有兩個顯著的特徵，第一是在數量方面急速擴張，其次，則是經費不足。這兩種特徵之間並不調和。這也說明教育的數量擴展政策，未能與政府的財政能力相配合。量的增加、經費不足對於教育的品質必定有所影響。

四、經費短缺對高等教育的衝擊

在考量經費不足對於高等教育的影響時，本文將首先評估校園的設施，如圖書

^① 羅家倫，文化教育與青年（臺北，華國出版社，民國41年），頁235。

^② 第三屆參政會第二次大會教育部工作報告書：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1943年8月教育部編印），頁8。

^③ 同前註。

^④ 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教育部分決議案辦理情形報告：1943年7月至1944年7月（油印本），頁6。

設備、建築、儀器；其次檢討教員與學生的生活狀況。爲了瞭解造成儀器設備嚴重短缺的原因，除了後天的經費不足外，必須追溯到戰爭初期，日軍的轟炸破壞，以及學校遷徙的損失。

戰爭初期大專院校的損失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盧溝橋事變以前，全國大專院校有 108 所，估計總資產約爲六千五百萬國幣，儀器設施等價值二千五百萬元，圖書設施則爲五百五十萬元。② 戰爭爆發後十八個月內，二十三所院校遭受日軍轟炸後全毀、停辦或關閉；③ 十四所嚴重受損；④ 其餘的學校則大多分佈於北平、天津與上海地區，受到戰事影響後紛紛遷至內陸地區或外國租界。全國僅有十一所原來在內陸省份的院校，未受波及。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的大專院校遭受毀損或影響，可謂中國高等教育的空前浩劫。主要原因自然要歸咎於日軍罔顧國際慣例，濫炸無武裝的平民區，另一方面也顯示：日軍有意報復，並摧毀戰前反日以及宣傳抗日意識的發源地一大專院校。日軍蓄意轟炸與破壞下，在戰事影響區域內的院校，倉促下不及撤離，紛紛被毀或遭受嚴重損失。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大學，由於羅家倫校長的個人遠見，盧溝橋事變後，立即準備遷移工作，才能將可移動的校產、儀器設備、圖書完整的搬往大後方。保存了該校元氣未受損害，也使得中央大學成爲抗戰期間設備最充實的大學，更是考生心目中名列前茅的明星學校。其他在戰事初發區域的四十所學校，總共損失 2,830,000 冊圖書，約爲當時全國大專院校所擁有書籍的百分之五十。

山東大學的遭遇，可視爲國內各大專院校在戰事爆發後所普遍面臨的困難。在搬遷途中，該校八百大箱中的儀器設備與 76,000 冊圖書，全部在浦口車站失蹤。浦口是津浦鐵路的交通樞紐，八百個大木箱在戰事緊張的時機，自然是日軍顯著的目標。如此龐大數量的貨物不會輕易消失，合理的推斷是落入日軍之手或被日軍銷燬。⑤ 山東大學遭此重創，在整個抗戰期間，都無法重建復校。

南開、北大與清華同樣損失慘重。南開在事變之後，日機首先輪番空襲，繼之以炮火猛轟，最後日軍進入校園後，又縱火焚燒倖存的建築。日軍是以南開在戰前庇護反日份子爲由，而痛下毒手。日軍對南開大學反日行爲的報復，也可視爲日本摧殘中國高等教育的典型暴行。北京大學命運並不比南開大學幸運多少，除了學生

② 教育部編印，全國高等教育概況（民國 28 年），頁 23。

③ 教育研究，卷 20，期 3，頁 5-9。

④ 同註②，頁 23。

⑤ 同註②，頁 24。

遭受嚴刑拷打之外，學校建築經常被用來做為刑求之地，學校設備、圖書均不及南遷，損失慘重。抗戰勝利後，北大教授吳大猷重返舊地，發現南開大學原有建築僅科學樓尚存，其餘大型建築如圖書館、宿舍、與實驗室等都被剷平。^{②5}

大夏大學在上海遭受相同蓄意破壞及摧殘的命運。所有建築在日軍轟炸下倒塌，沒有一棟房舍倖存。學校原有 50,000 冊圖書中，僅 7,000 冊被搶救出來。該校全部損失約為二百萬國幣。^{②6}

上述四所學校的遭遇，是當時大專院校的普遍命運而非特例。日軍處心積慮的破壞，使中國高等教育面臨難以續存的危機。教職員生由日軍佔領區逃出以後，在大後方集合，擬重建學校，卻發現一無所有，難以構築校舍。以合併設校的方式，較為可行。北大、清華與南開於民國二十六年底，合組長沙臨時大學（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其物質情況至為簡陋，梅貽琦認為長沙臨大時期是西南聯大最慘淡的日子。^{②7} 有人更描述長沙臨大像個難民營。^{②8}

校園房舍短缺

大專院校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首先遭遇的難題就是缺乏房舍以供教學與研究之用。內遷的院校幾乎全部必須重建校舍，或以租賃的方式找尋合適的教學房舍。由於經費短缺，教育部指令所有院校不得擅自興建校舍，必須先向公家或私人租用為原則，除非學校所在地無房屋可租。^{②9}

部份學校很幸運能租到民舍及農舍，卻發現這些建築都格外簡陋。民間建築本來就不是為教學或研究的目的所設計，因此，只能勉強使用。某些學校甚至被迫使用廟宇及地方祠堂作為教室。廈門大學在民國二十六年底遷往福建長汀時，就只能利用廟宇、祠堂為教室，並租下一間餐廳作為職員宿舍。^{③0}

租用民房為校舍，不免產生另一個問題，就是校舍零散分佈於各地，造成極大不便。梅貽琦說明清華大學遷往昆明後，所產生的困擾可為代表。清大租用民房為大學辦公室，另外又租了昆明當地的學校為教室及學生宿舍。學校的行政事務如教務、總務等單位分散在工業學校內，工學院則遠在城的東區。民國二十九年學校有

②5 吳大猷，「抗戰期中之回憶」，傳記文學，卷 5，期 3，頁 9。

②6 歐元懷，「抗戰期間大夏大學的苦悶」，教育雜誌，卷 29，期 4（1939 年），頁 43。

②7 梅貽琦，「續談抗戰期中之清華」，教育通訊，卷 3，期 15，頁 12。

②8 莊澤宣，「戰時教育設計」，抵抗（上海），期 21（1937 年 10 月），頁 8。

②9 教育部編印，教育報告：民國 27 年 10 月國民參政會第二期集會政府提出（民國 27 年），頁 14。

③0 鄒文海，「懷念薩本棟校長」，傳記文學，卷 1，期 3，頁 21。

了足够的經費後，計劃興建學校自己的教室與宿舍，卻發現唯一可供建築的地點在西門。清華大學的校舍散落於昆明市的廣大區域內，無法集中，北大、南開的情況大致雷同。清華與其他學校相比，算是極為幸運，因為，清華有獨立的經費來源可供建築之用。爲了研究工作的需求，清華租了農舍百畝，並建了數十棟茅草屋作爲實驗室。儘管如此，梅貽琦卻認爲這些經費也只達到戰時清華需求的半數。^③

清華在戰時尚有獨立額外經費來源，可算是一個特例。其他學校則一貧如洗。經費連教員薪資的發放都尚有問題，更遑論校舍是否足夠。

儀器、設備短缺

第二個問題則是儀器、設備短缺。幾乎所有大專院校設施都無法滿足最基本的教學需求，理工科的儀器缺乏則最爲嚴重。文、法、商科可以口授的方式上課，影響尚不算很大，工學院的學科則影響教學品質，何況，沒有儀器，教員能教書而無法從事研究工作，專業知識的停滯是普遍的結果。爲了獲得最基本教學急需的儀器，必須請求返國的留學生及教員携回。^④自然，這些設備必須是簡便型，才能個人携帶。部份教授甚至親自動手製作儀器、設備。^⑤大夏大學還把校長座車解體，拆下汽車引擎當做學校的發電機。^⑥

中央大學是唯一能把學校設施完整的遷移至內地的大學。這個例外是基於羅家倫校長個人的遠見與對時局的透徹觀察。民國二十五年，羅家倫已經預備了數百個大木箱，以供裝運校產及圖書，準備後撤。「七七事變」後的兩週，連實驗用小動物，農學院家畜，全部後送，毛髮未傷，保留了中央大學的實力，也使中央大學成爲戰時聲譽最佳的大學之一。羅家倫個人在戰前即深信，中、日之戰不可避免，乃提早準備搬遷事宜。另外，羅自民國二十年以後即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與決策最高當局保持密切關係，較易獲得時局發展的重要訊息，而及早動手遷移。^⑦與其他學校比較之下，中大是戰時設備最好的大學。儘管如此，民國三十一年，羅家倫評估中大的情況，依然發現，學校設備無法滿足基本的教學需求，設備不足是嚴重的問題，造成這些困境的主因是消耗品無法補足以及經費上的短缺。^⑧

③ 梅貽琦，「續談抗戰期中之清華」，教育通訊，卷3，期15，頁12。

④ 梅貽琦，前文，頁21；吳大猷，前文，頁7。

⑤ 鄒文海，前文；吳大猷，前文。

⑥ 鄒文海，前文。

⑦ 羅家倫，文化教育與青年，頁223-225。

⑧ 同前註，頁236。

不只中央大學，戰時所有大專院校都急切需要採購儀器設備，以供基本教學所需。設施短缺的狀況在抗戰初期，就已經極為嚴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楊振聲就曾經在大會中大聲疾呼，正視此一問題，並且要求民國二十七年度高等教育經費，百分之十五應該特別規定，用以購買儀器設備專用，否則高等教育無法維持下去。^⑦ 儘管從民國二十九年度，三十年度以及三十一年度都有額外的預算提撥為教育經費，某些物品根本無法從國內獲得。海外訂購教學用品，更面臨其他的困難，運送過程歷經波折，經常延誤送貨日期，嚴重的甚至從訂貨到取貨長達數年之久。教育部在民國三十三年度的工作檢討中，就曾說明海外採購器材的艱困狀況：美國是我國大專院校主要器材來源地，有時需要四年時光，才能收到訂貨。^⑧

八年抗戰期間，所有高等教育的機構，都為取得基本教學所需的器具而努力。學生對於有限資源下，所能提供的儀器益感需求殷切，這又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大部份學校覺得設施得之不易，為了珍惜得來不易的設備，惟恐在使用時受損，乾脆收藏起本來就數量不足的儀器。結果，自然是學生失去實驗的機會。^⑨ 對於學習自然及生物科學、工學院的學生，實驗是重要的課程，沒有這類課程，自然造成嚴重的缺失。民國三十三年，教育部評估教育品質時，曾提出大專院校設施不足的報告，並認為這個現象逐漸影響教學的效率與學生程度，教育的品質更無法改進。^⑩

圖書短缺

第三個問題是圖書短缺。圖書資料是大學最寶貴的資源之一。建築與儀器設施可以重建或重購，但圖書館的藏書一旦損失，通常無法彌補。在戰亂流離的時期，幾乎所有大專院校的圖書，非毀於戰火即散失於遷徙之中，大量重新購置，是各校共同面臨的棘手問題。時間與金錢更是兩個最大的難題，大專院校在戰時既沒有經費買書，也沒有充裕時間等待書籍到來，一切都是如此急切。另外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圖書不但供應不足，而且非常昂貴。書籍昂貴的現象，自然又引起參政員的質詢，參議員張申府就曾經在參政會中詢問教科書價格高得離譜。^⑪ 為了適時補充圖書館的書籍，依然面臨三個大問題急需解決：中文教科書印刷廠的地點遠離學校，

^⑦ 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記錄（民國27年），頁91。

^⑧ 教育部編印，教育部三十三年度教育工作檢討，油印本（時間不詳），頁6。

^⑨ 教育週刊（福建），卷2，期3（民國31年6月），頁10。

^⑩ 同前註，頁6。

^⑪ 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議事記錄，（民國28年），頁157。

紙張與運送書籍的成本高昂，以及書本在運輸的優先秩序上往往被列為不重要的地位。

大後方的書店與出版商無法為大專院校出版足夠的書籍，因為大部分國內的印刷廠均位於上海租界內。大專院校內遷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仍能向上海訂書，但是需求者散居廣大的內陸地區，紙張與印刷材料短缺等因素促成書價急劇高漲。戰前，運費大約只佔書價的百分之五，但在民國二十九年二月時，運費約為書價的1.5倍。紙張與印刷材料短缺也使紙價較戰前上揚10倍。^④

最後，即或能湊足了預訂的書款，運輸過程仍然可能對書本造成損壞。幾乎所有的書都由海運送至海防，再由車輛轉送內陸。越南海防當時是我國東南沿海陷入日軍手中之後，最為便利的港口，一切物質的吞吐運送均仰賴海防。在戰時，一切以軍事物質的裝卸為優先，自然很難要求書籍被列為緊要輸送項目。成箱的書籍擱置在船上等待卸下是習以為常的事。在海港內充滿潮濕與鹽分的空氣中，對於書籍的傷害是停留的時間越長則損害越大。此外，在海防卸下後，還要歷經一段遙遠的路，才能由陸路運送到大後方。無怪乎，在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教科書的市價整整上漲四倍。書店沒有存貨的教科書，只能從黑市中購買。^⑤同年八月，日軍攻陷海防，書籍的取得更形困難。所有書籍必須經由緬甸陸運或印度空運來華。

書籍的補充既成問題，原有的存書就更形珍貴。部份大專院校為了防止日機空襲的損害，以及書籍補充不易的問題，索性將書籍封存或深藏於山洞之中。^⑥中央大學就是採取這種方式來保存圖書。中大的藏書在戰時居第一位，但僅提供二萬冊書以供借閱。圖書館的座位僅能容納二、三百人，^⑦但全校學生人數在民國三十年是3,150人，^⑧學生必須爭先恐後才能借到書。西南聯大圖書館也有同樣的困難，學生每天必須爭奪座位並搶借圖書。^⑨

為了解決圖書嚴重短缺的問題，國民政府特別在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及三十一年，連續三年提撥額外經費，由國外購書。但是由海外運送延誤的問題使圖書的

④ 陳劍恆，「書價高漲與嚴重的書荒」，教育通訊（重慶），卷3，期7（民國29年2月24日），頁3。

⑤ 同前註，頁3-4。

⑥ 教育週刊（福建），卷2，期3（民國31年6月1日），頁10。

⑦ 文化教育研究會編印，中國現時教育問題（民國31年），頁4。

⑧ 羅家倫，文化教育與青年，頁231。

⑨ 同註⑦，頁4。

供應及補充遲滯，部份書籍直到民國三十三年才送達。^④

補充戰時圖書損耗的另一個辦法則是請求國際友好國家捐贈，英、美兩國在中國的籲請下，均曾捐贈成千上萬的圖書給大專院校。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在民國二十七年曾分別寫信給英、美兩國的圖書館協會要求捐贈書籍。^⑤由美國各圖書館、大學、出版社所捐贈的圖書與期刊，在民國二十八年時約收到25,000冊，隨後幾年亦有數千冊陸續到來，這些書都是經由香港轉送雲南，然後再分發到大後方各院校。但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捐贈停止。英國在同時亦贈送了大約一萬冊左右的圖書。然而，民國二十八年九月，英國向德國宣戰後，捐贈亦停止。^⑥

五、通貨膨脹對教員與學生的影響

「七七事變」以後，大專院校教職員的薪資，政府改為減成發放，大約減少了原薪水的二至三成。^⑦抗戰時期，大專院校教員及其家人的生活水平能否維持，則依靠國幣幣值是否穩定。民國二十九年底，通貨膨脹惡化，零售物價與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相比，上揚了7.2倍，教員生活遭受嚴重打擊。在此期間，政府曾想辦法解決教員食的問題，民國二十八年度下半年以研究獎助金的名義發放補助金，二十九年度又加發生活補助金及食米代金。^⑧但是，教員生活依然清苦。政府因此在民三十一一年一月決定，全額發放教員薪資。^⑨

儘管有這些補助金及其他補救措施，但仍然無法解決生活狀況日益艱苦的困境。

大學教員的薪資

大學教員的生活品質降低主要的原因是由通貨膨脹所引起。急劇惡化的通貨國幣，使民國三十二年教員的薪資實際購買力，僅及民國二十六年的五分之一。^⑩民國三十二年的情況更形惡劣，實際收入僅達二十六年的十分之一。^⑪楊格 (Arthur^I

^④ 教育部三十三年度教育工作檢討，頁6。

^⑤ 北平圖書館在「七七事變」之後遷往昆明。

^⑥ 徐家驥，「袁守和先生在抗戰期間之貢獻」，傳記文學（臺北），卷8，期2，頁41。

^⑦ 教育部編印，教育部工作報告（民國30年），頁7；教育通訊（重慶），卷4，期2（民國31年1月），頁4。

^⑧ 教育部工作報告，頁7；國民黨編印，十年來之教育與文化，頁19。

^⑨ 教育部工作報告，頁7。

^⑩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23.

^⑪ 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中華教育界（上海），復刊卷1，期1，頁4。

N. Young) 是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財政顧問，他的評論最爲中肯：「通貨膨脹的衝擊最嚴重的是在教育制度上。」⁶⁶

由於「實際」收入驟減，使大學教員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一位西南聯大外籍教授 Robert Payne 發現，一位鄉下廚師的薪水在民國三十二年是大學教授的八倍。⁶⁷廈門大學校長薩本棟與夫人(任職於另一學院教授)的薪水，兩人的每月收入合起來也僅够二十天的家用，其餘的日子必須向銀行借貸。⁶⁸大學校長尚且如此，其他教員生活之艱苦可想而知。許多教授靠著變賣家當過日子，也有開餐廳或商店以補充收入。⁶⁹西南聯大教授吳大猷，在民國三十二年曾經試著飼養兩隻小豬，以解決生活窮困的情況。不幸，他的豬一隻染疾而終，這隻豬死的時候太小而無法出售。另外一隻長得稍大賣出時，他也無法算計這項嘗試是否賺錢或賠本。⁷⁰

大學教員生活水平逐年下降，一位外籍教授 Robert Payne，描述復旦大學教員在民國三十一年三月物質生活，可爲一般教員的普遍狀況：「此地的教員可謂一貧如洗。他們鬆垮的外套補滿了不同顏色的補丁，鞋跟都已脫裂。」⁷¹民國三十三年三月，Payne 轉往西南聯大任教，他發現聯大情況與復旦相同。幾乎找不出任何教授或學生的衣著上沒有破洞。⁷²

民國三十二年教育部向國民參政會報告教育界人士生活狀況時承認：由於通貨膨脹的影響，各級教員的收入都無法養家。⁷³蔣委員長也在民國三十二年表示：知道教員生活艱苦，但希望大家以儉約、節省的方式，渡過經濟的困境。⁷⁴

薪資不足以維持生活，教員又沒有其他途徑足以彌補收入，有不少教授離職另謀高就。南京大學教授貝克就曾經敘述教員的薪水與離職的心情：

目前大學教員的薪水及補助，並不足以維持生活的需求，並產生不安定的情形。雖然大家都願意繼續任教，但是，大家擔心如何維持生活，因而有許多離職，或者尋求待遇更好的職務。⁷⁵

⁶⁶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p. 323.

⁶⁷ Robert Payne, *Chinese Diaries: 1941-1946* (New York: Weybright & Talley, Inc, 1970), p. 158.

⁶⁸ 鄒文海前文，頁21。

⁶⁹ 文化教育研究會編印，中國現時教育問題（出版地不詳，民國31年），頁4。

⁷⁰ 吳大猷前文，傳記文學，卷5，期3，頁8。

⁷¹ Robert Payne, *Chinese Diaries: 1941-1946*, p. 103.

⁷² 同前註，頁216；吳大猷的描述與 Payne 的回憶相同，見吳大猷前文，頁6。

⁷³ 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教育部工作報告書，頁11。

⁷⁴ 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民國73年），卷3，頁3241。

⁷⁵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p. 324.

教育部也體認到，大學教員經常為非教育性的機構所挖角，是因為這些機構待遇較佳。教育部評估：師資的流失，是教育界的嚴重打擊。⁶⁶事實上，教育界人士認為大學教員轉業是教育的最大危機。⁶⁷

教員居住環境

大專院校在戰時為了找尋教學用房舍都有問題，教員宿舍的短缺可以想見。西南聯大雖然是戰時最負聲譽的大學之一，但教員宿舍依然無法滿足需求。吳大猷追憶，聯大的一棟建築內有七間小房間，配給已婚教員，總計有九家二十一口人擠在這七間小屋子內。⁶⁸

另外位於昆明北郊的部份教授宿舍，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每一棟房子有三個小房間，每間容納一戶人家。室內沒有地板，僅有光禿禿的泥巴地。隔間的牆由泥土混上竹片築成，但是高度只與樑齊，上空。少部份房間有瓦蓋的屋簷，大部份則由茅草覆蓋，一位聯大教員回憶這些建築的光景極為生動。他住在一棟建築的中間，由於牆實在太薄，以致於居住在三間房子的三家人，不必提高聲音就可以互相交談。⁶⁹在這一區域內其他的房子情況稍好，但牆也是奇薄如紙，一位教員說：牆薄到隔壁思考時發出的鼻息聲都可聽到。因此，在房間內根本無法工作。⁷⁰

中央大學的狀況與聯大相同。中大的財政狀況較其他學校為佳，但是，教授宿舍依然極為簡陋：

教授宿舍既暗且濕，低矮狹長的建築內，由窄小的走道通向各各小房間，房間內有小床以及狹窄的走道。通常全家擠在這些小房間內，有時候雨水由破瓦中潺潺而下。紙窗上的破紙像旗幟般在寒風中飄盪，真是冷。⁷¹

私立院校的宿舍同樣簡陋。復旦大學校長以一所老舊農舍為家，屋頂並且漏水。

教員健康狀況

居住空間狹小、陰暗、潮濕，再加上營養不良，教員很容易造成心理上與生理上的疾病，家人同樣染病及死亡的機會也增加。傷寒是最常見的病症，另外，頭暈目眩也很普遍。Payne 認為醫療及日常食物並不非常短缺，只是教員收入低，無力

⁶⁶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教育部工作報告書，頁11。

⁶⁷ 陳禮江，「迎接勝利年」，教育通訊（重慶），卷4，期1，頁碼不詳。

⁶⁸ 吳大猷前文，頁6。

⁶⁹ 章廷謙，「在昆明」，國立北京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⁷⁰ Robert Payne, *Chinese Diaries: 1941-1946*, p. 250。

⁷¹ *Ibid.*, p. 75.

購買而已。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他在日記中記載：過去十七個月內，至少有三位教授病亡。他的評論是：以如此低微的收入，教員無法抵抗疾病。^⑳最悲慘的例子是一位聯大教授的妻子死亡，他身無分文，無法替亡妻買個棺木，還得靠同事、朋友、學生的捐款才能下葬。^㉑

因此，教員情緒低落是可以理解的結果，戰爭的壓力與日機的空襲轟炸也使他們的不安全感加劇。如果妻兒又分居異地，未能團聚，這類的教員則更形焦慮、煩躁。更加以居住空間狹窄，很容易造成衝突。吳大猷回憶許多教授心理上不穩定的狀態。他記得聯大二位教授為了一件小事大打出手。^㉒戰時擔任西北大學校長的賴景瑚，也認為該校教員與學生在情緒上很緊張，而且極為焦慮，一點小刺激也立即會造成問題。^㉓ Robert Payne 認為八年抗戰使某些教授罹患心理失常，嚴重心理創傷，與絕望感。^㉔

對學生的衝擊

學生的情況較教員更為惡劣，教員至少還有薪水過活。戰前，學生絕大多數依賴家庭的財政支援，戰事爆發後大多數學生與家庭斷絕音訊。戰事爆發後，在戰區的家庭自己也面臨財務及其他的困難，根本無法幫助在學子女，絕大部份學生立即陷入財政困境。

為了解決學生所遭遇的財務困難，政府提撥了各種貸款及補助金。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國民政府首先建立了「貸金制度」，貸款給家庭陷入戰區的學生。民國二十九年底又增加食米補助及貸金。這些貸金與其他各類補助在抗戰時期也逐年增加。

我們前面已討論對教員的補助，政府曾經非常努力，但是，無論貸金、補助、與研究獎助都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相比之下學生的生活則更為艱苦。民國二十九年一月，通貨膨脹加劇，政府補助款的增加，以每個月為基準。以伙食補助為例，在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三月及四月，一共增加三倍。^㉕由於政府本身亦陷入財政預算赤字之中，經常無法按時發放補助款項。經過協調溝通後，有時政府提早

^⑳ *Ibid*, p. 241.

^㉑ *Ibid*, p. 250.

^㉒ 吳大猷前文，頁7。

^㉓ 賴景瑚，「西北工學院與西北大學」，傳記文學，卷8，期5，頁13。

^㉔ Robert Payne, *Chinese Diaries: 1941-1946*, p. 253.

^㉕ 教育部編印，教育部三十二年第二屆工作進度檢討報告，頁1。

提撥補助金。這又造成另一項困擾，那就是預撥款項經常在其後的月份裏，無法趕上通貨膨脹的速度，而不足以購買預定數量的糧食。

爲補償收入不足的困境，學生以兼職或假期打工的方式彌補。⁷⁸ 學生一般所做的工作包括經營小本商店，打字，銀行助理或者兼任高中學生的家教，也有些來往於滇緬公路上走私物品到內地販賣。⁷⁹

由於戰時學生財務的危機，因而普遍患有營養不良的症狀。⁸⁰ 美國武官 David D. Barret 在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向美國政府的報告提到：昆明的學生「實際上有處於饑餓邊緣的危機」。⁸¹ 一位大學生認爲政府補助金及貸金甚至無法買到最爲粗糙的糙米過活。⁸² 一位中央大學教員描述民國三十一年一月的情況，覺得中大的教員與學生看起來像沒有吃飯，而且臉色蒼白，滿臉倦容。⁸³ 他對於學生則「極爲憂心，他們吃得這麼壞，而且是一文不名。」⁸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也曾評估當時青年學生生活，並認爲營養不良與設施簡陋是兩大現象。學生早晨爲了搶盛稀薄的稀飯，晚上又忙著搶佔檯燈而努力。因而，學生普遍對學校當局不滿。⁸⁵ 學校當局掩飾學生面臨饑餓邊緣的事實，而不願外界知道。聯大教授聞一多曾批評這麼掩飾無助於抗戰，饑餓也無助於八年抗戰。⁸⁶

學生的健康問題與教員一樣極爲嚴重。營養不良，食物不足，醫療設施不夠，造成學生健康狀況日趨惡化，肺結核、傷寒、砂眼、猩紅熱、虐疾等病症都很普遍。⁸⁷ 根據一位醫師的報告，戰時的學生百分之四十患有肺結核。⁸⁸ 廈門大學的普查發現：該校男生大多患有糖尿病，女生則以蛋白尿症者居多。⁸⁹ 西南聯大診所在民國三十三年發表的一項統計，可以做爲大專院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抽樣標本。該項

⁷⁸ 有關聯大學生打工的問題，看 John Israe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ervation as an Ultimate Value", in Paul K. T. Sih,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77).

⁷⁹ 中國現時教育問題，頁93；陳鼓應，殷海光最後的話語（臺北，世界文物供應社，1970），頁122。

⁸⁰ John Israel, p. 144.

⁸¹ David D. Barret to Government: Comments on Current Events, January 8, 1940,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p. 6.

⁸² 希光，「當前青年學生的健康的問題」，西南青年（桂林），卷2，期8（1941年11月），頁17。

⁸³ Robert Payne, *Chinese Diaries: 1941-1946*, p. 73.

⁸⁴ *Ibid*, p. 74.

⁸⁵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工作、總檢討報告，1944年（出版地不詳），頁20。

⁸⁶ 朱自清，聞一多全集（上海，開明書店，1948），頁56。

⁸⁷ John Israel, p. 145; Robert Payne, p. 73.

⁸⁸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記實（出版地不詳，1944），頁192。

⁸⁹ 鄒文海，「懷念薩本棟校長」，傳記文學，卷1，期3，頁22。

統計發現：百分之九十的學生患有疾病。^⑩同年十一月份，該校診所又發表了一份報告，說明民國三十三年共診治了2,189名病患。其中1,033名病人患有內科方面的疾病，573名患有眼疾。^⑪學生罹患了像傷寒這類疾病，他們對於醫療費用的憂慮，遠超過對疾病本身的恐懼。一位教員描述學生的憂慮如下：

不是病痛使學生害怕，雖然病痛很使人痛苦，但是他們更擔心醫療費用。像傷寒一類的病症需要7,000元國幣，學生怎麼會有辦法籌到這筆錢。^⑫

六、結 論

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極為重視高等教育，並希望經由大專院校培育出未來建國的人才。因此，戰時大專院校學生都享有暫緩服兵役的權利，與其他處於國家戰爭狀態的國家如日本、美國相比，國民政府保留社會精英的苦心至為明顯。而且，在戰時政府執行擴充高等教育的同時，部份相關措施如：貸金、補助金，以至於後期演變為全部大專學生公費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其目的都是在支持國民政府高等教育擴張政策。但是教育部推展大專院校與學生數量擴充政策的同時，未能審慎的考量政府的財政能力，以至於使得決策執行過程產生偏差，造成民國三十一年以後，雖然通貨膨脹逐年惡化，國民政府的財政危機日益加劇，但是，大專院校的學生及院校數量反而呈現大幅增加的矛盾現象。教育部及戰時國會——國民參政會，都曾經檢討過大專院校師生所面臨的財政困境。教育經費不增反減的情況下，要求教育品質維持一定水準是很困難的事。抗戰時期高等教育雖然培養出像李政道、楊振寧這一類諾貝爾獎得主，但平均而言，教育品質低落。低落的教育品質固然與日軍的空襲轟炸及肆意破壞有密切關係，然而教育部忽略了政府的財政能力，大肆擴張高等教育，致使教員與學生遭受身心的雙重創傷，並陷所有師生於饑餓邊緣。再者，教育擴充政策制定後，執行期間遭遇困難時，若能及時更正偏差，則不良的影響程度或能減輕。

⑩ 三十年度教育工作檢討，頁26。

⑪ John Israel, p. 145.

⑫ Robert Payne, p. 195.